

[学术论文]

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的介入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古学斌

摘 要 此论文旨在向中国内地的读者介绍行动研究的方法及论证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介入的关系。笔者通过自己亲身参与的在云南农村开展的一项农村社会工作行动研究项目，展示行动研究的实作过程，让读者明白社会工作研究者如何通过行动研究的方法，回应在地社区民众的需求，通过赋权/培力在地民众，使她们成为自己发展的主体。

关键词 行动研究 方法论 社会工作介入 赋权/培力

导 言

作为一门实践性学科，社会工作的研究并非只是为了做研究而研究、为建构理论而建构理论，而是为了实践而研究。这正是社会工作知识的本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之处。一般而言，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目標主要是理解社会、描述社会现象以及解释社会的运作、社会问题背后的原因。虽然社会工作也从事这样的研究，但社会工作会更进一步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路径。譬如，社会工作研究农村贫困问题，并不只是为了理解农村贫困现象、解释贫困产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在了解贫困的原因后，进一步寻找消除农村贫困的策略和方法。

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助人专业，如今大致分为两种取向：增能取向的社会工作与医疗取向的社会工作。目前，具有反思力和批判精神的社会工作同仁对医疗取向的社会工作的批评是：这种助人工作“一方面缓解服务对象的困难处境，然而另一方面同时也削弱服务对象对于社会体制结构不公义的进一步觉察。并且服务对象自己面对和承担困境所能培养出的能耐也可能受到专业服务的介入因而减弱”（陶蕃瀛，2004：33）。因此，增能取向的社会工作与医疗取向的社会工作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增能取向的社会工作重视对服务对象和在地民众的增能，在过程中强调平等的伙伴关系，强调促成个人、家庭、组织或社区的能力的提升，使其更有信心、勇气，自愿采取行动改善自身的处境地位，最终使服务对象成为自我发展的主体（陶蕃瀛，2004）。对增能取向的社会工作者而言，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希望在研究过程中培力参与的民众。要达致此目标，行动研究恐怕是最佳的选择。

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是一种新兴的研究范式，也被看作一种实践培力增能之助人工作方法。它集研究、教育和实践于一体。笔者认为这种方法是社会工作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因为从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本主张、研究目标到研究的手法都与社会工作的内在特质非常贴近。例如，在农村社会工作的领域中，行动研究能够很好地帮助农村社会工作者认识农村社区，在实践行动中寻找研究问题，制订农村社会工作的介入方案和实践行动方案。更重要的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反思与农村社区民众的位阶、合作信任关系，在资料分析过程中持续地反思^①，与现有的理论进行对话，累积经验，从而建立新的理论和实践模式。

在本文中，笔者将介绍行动研究出现的背景、它背后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以及行动研究过程和手法。另外，本文亦用笔者亲身参与的农村社会工作案例，阐述农村社会工作行动研究的实作过程。通过本文，笔者希望读者能够基本把握行动研究与农村社会工作的关系，初步掌握如何应用行动研究于农村社会工作的介入。

^① 台湾学者把 reflection 翻译成“反映照镜”，意思是反思好像是一面镜子，通过它能看到自己在研究过程中的行为如何影响研究的结果。

一 行动研究的背景

行动研究的概念并非今天才有，Kurt Lewin (1890 ~ 1947) 最早提出这一概念。Lewin 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从 1944 年起开始使用“行动研究”这个词。经过 60 多年的演变，行动研究的内容和方法都有了不小的变化，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元，也被越来越多的专业（包括教育学、社会工作、心理学等）所使用，可以说是一种跨学科和领域的研究方法。

行动研究在近年来备受实用/实践取向的学科和关注行动的学者重视和采纳，这与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主流实证研究的不满有关。第一，实务界越来越多的实践者（或者称为实务工作者）觉得学术界生产知识的研究工作通常是由具有研究技能的研究专家、学者们垄断，研究者和实践的行动者是割裂的，学术研究生产出来的知识与实务是脱离的，其知识的生产对实务界的实际工作并没有帮助；第二，政策制定者也发现传统的学术研究脱离现实，并未能针对政策制定给出实质性的建议。由此，学界内部不少具有反思力和批判精神的学者开始提倡学术转向，致力于寻求与实务联结的研究方法，希望研究的结果能够针对政策制定给出实质性建议，能够给实践和行动带来指导意义，甚至希望知识生产活动（包括研究本身）能够更好地服务在地社区和民众。

尽管如此，这么多年来，大家在行动研究的定义上还是有一些分歧。有些学者会特别关注行动研究的技术层面；有的却看重行动研究背后的价值理念，譬如，坚持民众的参与研究和行动过程如何体现背后的价值。根据行动研究最早的倡导者之一 Lewin 所言，行动研究最重要的特征是：行动与研究结合，关注行动过程中什么样的动力和条件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与改变。后来 Somekh 与 Lewin (Somekh & Lewin, 2005) 又对行动研究做了更全面和清晰的总结，他们界定行动研究要遵守八个重要的原则：

- (1) 行动研究结合了研究和行动；
- (2) 行动研究是研究者和参与者的协同研究；
- (3) 行动研究必须建构理论知识；

- (4) 行动研究的起点是希望社会变迁和致力于社会正义;
- (5) 行动研究必须有高度的反身性 (reflexivity);
- (6) 行动研究要探索各种各样的实用性知识;
- (7) 行动研究对于参与者而言必须产生强有力的学习 (powerful learning);
- (8) 行动研究必须将对知识的探究放在更宽广的历史、政治和意识形态脉络下。

以上都是行动研究的重点,但作为社会工作行动者,我们更倾向于采纳 Reason 和 Bradbury 对行动研究的理解。他们把行动研究界定为一个构建对人类有价值的实用性知识的民主和参与的过程。他们强调行动研究根植于参与式的世界观。行动研究的过程必须将行动和反思、理论与实践结合在民众的参与当中,探寻对满足民众个人和社区需求有用的方案。所以对他们而言,行动研究不只是研究方法,同时还是通过系统的证据收集和试验,探究如何提升专业介入的质量,从而更好地服务民众的过程 (Reason & Bradbury, 2005)。

二 行动研究议题及其知识论

有别于其他的研究方法,行动研究有它特定的研究议题和研究目标,也秉持不一样的知识论。任何一位从事行动研究的人都需要问以下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 什么样的研究才算是行动研究?
- 我们做研究是为了什么?
- 谁是研究中最大的受益者?
- 什么样的知识才是科学的?
- 价值中立的研究可能吗?
- 什么样的研究伦理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 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研究策略? 如何决定?
- 谁是研究主体? 研究对象在研究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许多学者或实务界的人员(也包括社会工作者)常常无法摆脱对传统研究的想象,也常常用行动-研究二元的思维方式来理解行

动研究。于是他们都会问：行动研究跟我们在做的实务有何区别？我们的实务算是行动研究吗？笔者的回应是：那要看你们是否把行动与研究结合起来，达到“行动亦研究”的合二为一。在行动研究中，研究（者）即实践（者）。台湾学者陶蕃瀛的解释更加清晰，他认为，“每个人都是行动者。每一个行动者都处于某一个社会位置，在该社会位置的角色与情境下行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在做行动研究，或者每个人进行的研究都是行动研究。要被归类为行动研究必须是有意识的研究工作，并且是行动者自主的研究。行动研究必然是从行动者真实的社会位置进行观察、搜集资料和分析”（陶蕃瀛，2004：36）。简单地说，行动研究就是行动者对自我，对自我所处之社会位置、情境、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对自己在某一社会情境下的行动或实践，以及/或对自己行动和实践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的自主研究。笔者身为国际期刊《行动研究》的副主编，也常常收到一些文章是研究者研究别人的行动，从观察者和他人的社会位置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并不一定是行动研究。但如果研究者对其他行动者或其他行动者的行动进行研究，也可能是行动研究。如果其他行动者不仅仅是被研究的对象，同时还是平等参与研究问题的形成、研究资料的收集与资料分析的协同研究者，则该研究也可以算是行动研究。^①

有别于传统社会科学的研究，行动研究有很强的实用性关怀。它不是一个研究者对行动者行动的研究，也不全然作为一种学术探究的研究方法。如台湾学者夏林清所言，它是致力于寻求改变的一种方法（夏林清，1993）。行动研究的目标非常清晰：其一，研究者是在其专业角色的社会实践中进行研究，是为了改进实务工作和更有效地完成专业实践而做研究，而不是为了研究而投身于观察其他行动者的社会实践（陶蕃瀛，2004）。其二，行动研究本身就是

^① 根据陶蕃瀛（2004）的解释，通常这类行动研究被称为参与式研究（Participatory Research）（Park，1992）或合作行动研究（Collaborative Research）（甄晓兰，1995）。此外，行动研究还以许多其他的名称出现，如参与式行动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Whyte，1991）、社区行动研究（Community-based Action Research）（Stringer，1999）、实务工作者之研究（Practitioner Research）（Fuller & Petch，1995）等。

一种社会实践，通过研究的过程，探究介入和改变的方法，从而改变现有的社会制度和系统、摆脱社会压迫、消除社会不平等、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要实现这些理想，行动研究的过程就要更加强调向民众学习，做增权的工作；在知识生产的层面更是要生产批判性知识（弗雷勒，2003）。所以，寻求一般人类行为规律和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与行动研究的信念是相违背的；关于特定情境的知识是行动研究希望得到的。

行动研究渊源于杜威的民主传统，也受法兰克福学派之批判理论的影响。拉美反殖民统治政治运动开创的反压迫者教育学对行动研究也有相当的促进。此外，行动研究也受知识建构论和 Donald Schon 行动科学的冲击与影响。由此，在知识论层面，行动研究旗帜鲜明地挑战和否定了实证主义科学的哲学观念，而接受一种后实证主义的知识观。在主流的实证主义研究中，研究者对知识生产过程进行全程控制，以保证知识生产的客观性。然而，行动研究反对实证研究为了保证客观性，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分离、在知识生产主体与客体间划界限的做法，同时也反对研究者以高高在上的专家身份从事研究工作；行动研究强调民众的参与，民众与研究者一同获取和创造知识。行动研究也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预设每个行动者都不是被动的客体。作为能动的主体，他/她们不断地影响行动的过程。行动研究挑战象牙塔式的学术研究，相信“在行动中获知/学习”（knowing through doing），而不是在“思考中获知”（knowing through thinking），一切只有在参与行动之后才能有所了解。此外，行动研究也反对普世性知识观，所以研究者并非要创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和理论，通过行动累积的一切经验和知识都是特定性、情境性的。

更为重要的是，行动研究否定社会科学那种价值中立的想象，拒绝那种研究过程可以价值中立的假设。每项行动研究都有强烈的价值介入取向，推动行动研究是为了改变社会，所以研究探索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化的过程（Elden & Chisholm, 1993）。正像国际期刊《行动研究》所发布的宣言一样“在这时刻，我们召唤大家一起介入前所未有的各种复杂挑战，包括贫困和社会不平等、气候变迁、全球化、科技革命、原教旨主义等。行动研究者关心研究的操守（conduct）和研究方法的使用。有别于传统的应用研究，我们更加关注如何让在地民

众参与到整个研究的过程中，包括问题的界定、研究步骤的制订、结果的诠释、行动的设计、成果的评估等。通过民主参与的研究过程，我们超越应用研究。”

社会工作是有强烈价值介入取向的专业学科，国际社会工作学院联盟（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Social Work）的网页清晰地表述了社会工作的内涵，那就是“社会工作专业倡导社会变革、促进有关人类关系的问题解决并推动人们的增权和解放以增进福祉……人权和社会正义的原则是社会工作的基础……社会工作源于人道和民主的理念，其价值观立足于对所有人的平等、价值和尊严的尊重。自从一个多世纪以前诞生以来，社会工作一直关注于满足人类需要及发展人类潜能。人权与社会正义是社会工作行动的动力与依据。社会工作与弱势群体团结一致，力求缓解贫困以及解放易受伤害的与被压迫的人，以提升社会的包容性。社会工作的价值观体现在全国性与国际性的专业伦理守则中。”

我们所创建的知识也是为了实现我们专业的目标。笔者在此再一次强调的是社会工作的特殊性，它是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所以它的研究也是实用取向的。然而，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才能为实践服务呢？笔者深信行动研究是最贴近社会工作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参与式行动研究。将行动研究用于社会工作的学科研究中，正是因为这种研究方法背后的理念与社会工作专业有相当的呼应：从理念、知识论到操作方法，都与社会工作相匹配。

三 行动研究操作过程与方法

理清行动研究的理念和知识论的发展脉络，我们需要进一步问：

- 什么样的研究策略是行动研究者最惯常采用的？
- 怎样制定这些策略？
- 研究主体和其他非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各扮演什么角色？

基于以上的理念和知识论基础，行动研究的操作过程和使用的的方法也是很精彩和丰富的。首先，研究过程是敞开的。有别于传统的研究，行动研究不可能固定研究的问题、选定资料收集的方法。很多时候，只有当我们来到社区/田野后，才有可能判断社区/田野中的民众

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所遭遇的是什么问题、他们关心的到底是什么。此时，我们才能判断到底适合使用什么方法才能理解他们的需求。在理解需求之后，我们才能决定采用什么样的介入行动手法。很多时候，方法的选取是在社区/田野的处境下与在地参与者一起决定的。由于社区/田野是不断变化和更新的，行动研究者也需要不断地对研究处境有新的界定，同时创建新的方法和技巧去理解新的处境与介入行动。

笔者过去在农村社会工作行动研究中，就采用过丰富多样的方法和技巧。譬如，在行动研究第一阶段需要了解社区的需求时，我们会采用口述史的方法来收集村民的生活故事，了解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同时发掘他们的能力和资产；我们也会用绘画的方式，请村民们一起绘制平寨村地图，从而更加了解社区的环境；当我们要做社区动员的时候，话剧表演和唱歌也是很好的方法；当我们要评估我们行动的效果时，个案访谈或焦点小组也是被经常使用的方法；影像发声（photovoice）或录像发声（videovoice）的方法也常被用于社区动员和民众参与。

行动研究者需要站在一种开放多元的角度上，在方法上持折中的、不排斥的态度。所以，在行动研究过程中我们可以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以实现我们的行动目标。不过，有一点是笔者一直强调的，那就是虽然我们的态度是开放和多元的，然而当我们发现方法/技巧与我们行动的目标和理念相冲突的时候，这些方法/技巧也需要被舍弃。譬如，问卷调查的方法，对笔者而言就是不民主的研究方法。因为整个研究的过程（包括研究主题的设置、问卷的设计、样本的抽取等）都被操控在研究者手里，民众只是被动接受访问的对象。至于这些题目是否对他们有意义，问卷中的答案他们是否明白、是否愿意回答，似乎都没有被咨询过。这种方法与行动研究的精神有所冲突，所以通常不会在行动研究中被使用；就算使用这种方法也必须改变原有问卷调查的程序和研究主客体的关系。

总而言之，行动研究的具体操作方法是多元的，不是固定不变的，是在社区/田野中因着需要而选用或创建的。行动研究是一个“大家庭”，按内容分有组织的行动研究、社区发展的行动研究、教育的行动研究、护理的行动研究等；按理念分有参与式行动研究、赋权式行

动研究、女性主义行动研究等；按功能分有实验形态的、组织形态的、专业形态的、赋权形态的等。

四 行动研究的步骤

一般而言，行动研究都要经历循环的周期。S. Kemmis 和 R. McTaggart 发展了一个简单的循环模型来展示行动研究的步骤（见图 1），包括计划、行动、观察和反思四个阶段。^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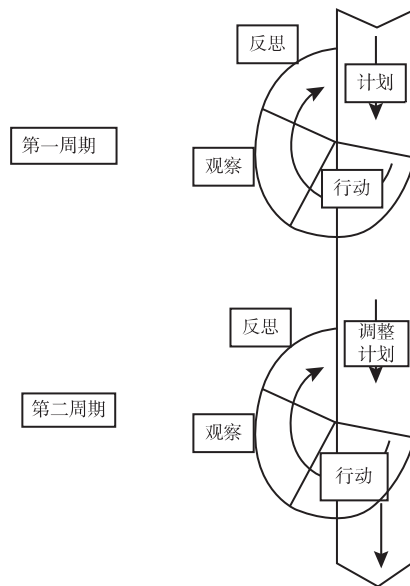


图 1 S. Kemmis 和 R. McTaggart 的行动研究模型

Gerald Susman (1983) 将行动研究的步骤进一步展开，把行动研究的周期分为五个阶段（见图 2），即问题的诊断和界定（也就我们通常所说的需求评估）、行动计划的制订（项目和服务的规划）、行动规划的推动、问题的再评估以及研究发现并从中学习，然后进入行动研究的第二周期。

^① 可以查阅 Dan Maclsaac (1995) . *An Introduction to Action Research* [On-line] (<http://physicsed.buffalostate.edu/danowner/actionrsch.html>)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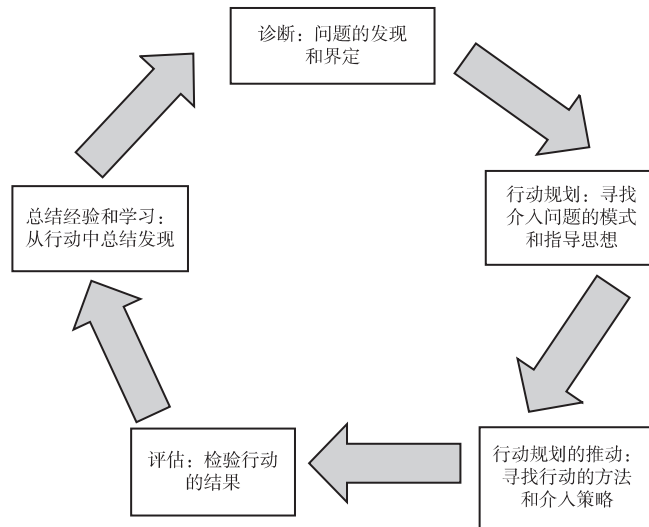


图2 Gerald Susman (1983) 的五阶段行动研究模型

当笔者和同事在中国农村推动行动研究的时候，就常常被问及什么时候离开。我们的回应常常是“当农民已经成长”，“农民的能力已经被提升”，“他们已经不需要我们的时候”。其实，行动研究的周期因项目的需要而定，没有特定的时间限制，有时是因为经费问题而终止，有时是因为发现走不下去了而终止，有时也是因为看到行动目标已经达致而终止。

在2013年合编的新书中，Maggi Savin-Baden 和 Claire Howell Major 又把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周期细化为八个阶段（见图3），并强调了以下几个重点：

- 强调权力的再分配；
- 强调民众的议程；
- 强调共享；
- 强调自我反思（self-reflective）；
- 强调知识和理解的共同创建。

不管是哪一种行动研究模型，在行动研究中，研究、行动、评估互相联结，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一个螺旋周期，而非一个线性过程。行动研究的过程反映了行动研究的本质特性，因为行动研究相信行动者是一个受特定情境与社会文化环境限制的行动主体，行动者在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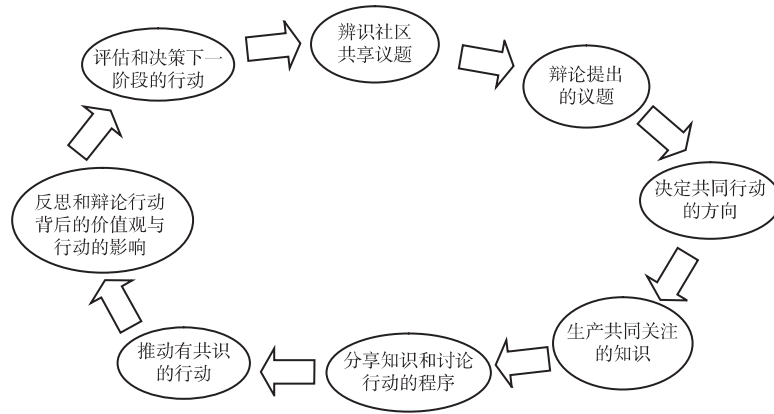


图3 Maggi Savin-Baden 和 Claire Howell Major (2013) 的八阶段行动研究模型

过程中累积了许多自己在行动原则方面的经验，加上社会文化传承的价值和集体选择，形成了自己也未必清晰的行动理论。在这些过往的知识、经验和社会文化价值引导下形成的行动目标、行动方法、行动理论需要在过程中不断被反省与诘难，培育出改变的勇气和能力（陶蕃瀛，2004）。这个过程是动态的，研究、行动、评估、反思批判如绳索般紧密联结、交互作用。评估和反思批判扮演重要的角色，没有这两个环节，将无法衡量研究的进展或重新定义问题，甚至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出现行动盲点。

五 行动研究中的三位一体

J. Gaventa 在 1988 年写的一篇介绍北美行动研究的文章中有一段话，清楚地指出了行动研究（特别是参与式行动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他说道“参与式行动研究通过民众自为地（people-for-themselves）参与到资料的收集与知识的创建过程中，致力于打破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知识生产主体与客体分离的状况。在此过程中，研究不再被简单地看成知识生产而已，同时也是教育、意识提升和行动发动的过程。”（Gaventa, 1988: 19）这正是行动研究与传统研究最大的差别所在，研究不单单是为了收集资料，同时还是研究、教育（自主教育）和社会行动（实践）结合的三位一体。

行动研究所强调的教育与我们传统上对教育的理解有所不同。这里关于教育的概念受巴西教育学家 Paulo Freire 的影响很大，教育被视为一种意识转化和觉察的过程。我们相信，行动者如果没有意识上的转化和提升，就只能是主流意识影响下的被动接受者和跟随者。因此，行动研究要达到增权/赋权/培力的目标，就必须有教育的介入。行动研究者通过教育介入的过程，一方面，在“行动中保持觉知并借着反身观察，觉知自我，以改善提升自我觉知程度，借此澄清辨明自我的价值与社会位置立场。同时要观照自身所处之社会情境与文化框架，以深化我们对外在世界与自我的观察”（陶蕃瀛，2004：42）；另一方面，在陪伴与支持在地民众（服务对象）面对其生命困境难题的同时，教育的介入使在地民众（服务对象）系统地认识自身的社会权力地位和造成自身当下生活处境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从而培养、提升在地民众（服务对象）的公民能力，增强其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能力和权力。意识觉醒后的行动，是一种有意识、有主体性的行动，是行动者自我抉择后的主动行动，这种行动也是可持续性的。

所以，笔者在农村推动行动研究时，需要采用不同形式的培训和介入手法来启蒙和提升村民的权力意识。譬如，笔者在农村看到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为了改变这种现象，必须推动各种赋权妇女的项目。其中的关键是能让妇女看到这种不平等、意识到父权文化对她们及其家庭的伤害，也能认清自己并不是愚昧无知的，知道自己没有知识和见识是由于生活机会的不平等造成的。要让妇女们的思想解放，笔者需要推动农村的性别发展和参与式的培训，用多元的形式（包括戏剧、话剧、小品和歌谣）来启蒙村民包括男性的平权意识。这些培训（包括开小组、做个案、搞大型社区活动）最重要的特点是让参与者真正能够发声，界定自己对现实的理解，掌控研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让社区的民众发现他/她们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在这里，行动研究者协助参与者掌控研究过程、协助参与者达致行动研究设定的目标。意识的启蒙和提升是行动发动的关键前提，在农村工作的过程中，笔者常常发现村民不行动，或行动没有可持续性，都是因为我们忽略了行动研究中三位一体的教育与意识的启蒙和提升。

六 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的介入——以云南农村妇女生计项目为例

要把行动研究说明白，笔者认为最好是将我们在云南农村做的一个妇女生计行动研究的案例与大家分享。通过对这个项目实施情况的介绍，让大家大致可以了解行动研究的基本过程。

从2001年3月开始，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云南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和云南省师宗县政府一起推动一个名为“探索中国农村能力建设的灭贫模型——云南的个案研究”的行动研究。项目所在地平寨村位于中国西南地区云南省的东北部。它拥有大约300年的历史，是由8个自然村寨组成的一个行政村，面积约23平方公里。村里只有一条机耕路通往外界。村子里的居民主要是壮族，也有少数汉族人。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全村壮族和汉族人口加起来共有347户1469人。

（一）行动研究的第一阶段

如果按照行动研究的周期来界定，这是问题的发现与界定阶段。最核心的工作是了解社区，与民众建立信任关系，贴近妇女们的需求。于是我们在村寨里驻扎，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与工作人员一起走访各村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访谈，我们发现村寨里人们的生活还不能达到温饱水平，依旧挣扎在贫困线上，所以平寨村被官方划为贫困村。一般情况下，每年有20多户人家缺粮4~6个月。像中国其他农村一样，平寨村在后改革时期也在经历巨大的变迁。在主流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农村的经济越发市场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越发城市化，这一过程其实给农村带来了深重的影响，表现为：市场经济导致村民面临日益严重的生计问题，城市消费文化破坏了农村的传统文化，出现了文化认同危机。

另外，我们也发现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妇女一样，平寨妇女正在经历着贫困。为了增加家庭的收入，她们从早忙到晚，还是无法应付家庭日增的开支。自2005年开始，我们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平寨妇女追随农村外出打工的浪潮，去煤矿或城市的工厂打工——尽管她们实际

上并不希望离开家乡。就像一个中年妇女告诉我们的那样 “我实在不想去，如果我在村子里能挣个几千块钱来支持我孩子的学费，我就不会去。离家真让人伤心。”

平寨妇女担负着养育下一代这一最重要的责任，并愿意贡献她们的每一分钱在孩子的教育上。她们还是家庭中的情感支持者和照顾者。当母亲被迫与孩子分开，远离家乡到城市里打工实在是让人感到悲伤的事情。由于母亲离开，没有人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家庭悲剧常常发生。即使是年纪大的孩子也感到悲伤，因为他们只能在母亲一年一次回家过新年时才能见到她们。在村子里，看到这些景象，我们寻索着如何响应妇女们在生计方面的要求，我们前后尝试了不同的增收项目（例如养猪）来帮中年妇女增收及提高其家庭的生活水平，同时也让农村的经济发展变得可持续。经过与村民讨论后，我们觉得应该将经济和文化结合起来推动一个新的项目。

2005年，受到公平贸易发展理念的启发，我们进行了另一项新的被称为“设计与发展”的行动研究，试图利用本土的传统文化来开发新的手工艺产品，一方面使在地妇女能够有生计上的改善，另一方面也保护和再生了在地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第一次进行跨学科和专业的合作研究，希望专业设计师能跟我们一起利用当地材料和本土手工艺来打造富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艺产品，通过公平贸易的途径，让妇女们能够得到合理的报酬，同时透过经济上的赋权达到性别和文化的赋权。

（二）行动研究的第二阶段

到了行动研究的第二阶段，我们寻找介入问题的模式和指导思想。我们团队主要由人类学学者和社会工作者组成，大家都持守一种共同的视角，那就是社区民众的能力和资产建设视角。能力建设视角的背后是相信在地社区的民众不管是贫困群体还是边缘群体都拥有他们自身的能力，只是这些能力常常被隐没和没有被发现（Saleebey, 1997; Sherraden, 1991; Tice, 2005; Templeman, 2005）。能力和资产建设的框架说明我们从优势的视角看待在地社区民众，看到的是其隐藏着的各种资产和能力，而不是盯着他们的缺陷、问题和无能（Ginsberg,

2005; Lohmann & Lohmann, 2005; Collier, 2006)^① 就像 T. Laine Scales 和 Calvin L. Streeter 指出的那样, 农村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是“去揭示和重新确定人们的能力、天赋、生存策略和激情, 以及社区的资产和资源”(Scales & Streeter, 2003)。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致力于赋权农村社区, 以创新的方式发掘和利用在地的资源, 创造出新的资产, 协助民众寻找和决定自己社区发展的方向。我们认识到平寨有丰富的文化资产, 妇女刺绣手工艺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决定透过推动妇女刺绣手工艺项目来推动妇女能力建设, 透过增加她们家庭的收入, 来增强社区民众的文化认同。

(三) 行动研究的第三阶段

当确定了行动模式和介入方法之后, 我们进入了最艰难的寻找行动的方法和介入策略的阶段。其中, 发掘和提升社区能力是首要任务, 我们希望在行动中推动个人和社区的能力建设, 最终达致社区的变革。^② 我们将这个阶段又细分为以下几个重要的部分。

1. 通过口述见证发掘壮族手工艺的文化意义

项目方案执行的初期, 我们把工作重点放在发掘传统刺绣手工艺的文化意义上。因为我们知道, 只有明白了刺绣手工艺与妇女生活的关系, 我们才懂得去欣赏她们的文化、欣赏她们的手工。

在方法上, 我们选用了口述见证 (oral testimony) 的方法。口述见证是推动社区参与发展的另类手法, 也是一种另类的参与性农村需求评价 (PRA) 的手法。通过口述见证的方法, 除了收集资料外, 我们还可以聆听到在主流话语之外的声音, 发掘那些在社区被压制或隐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 口述见证也是为社区弱势群体赋权的手法,

^① 能力建设的模式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小区发展的项目以推动个人和集体的能力建设 (参见 Moyer et al., 1999; Li et al., 2001)。与“赋权”、“参与”和“性别平等”等概念一样, 能力建设被认为是所有可持续的和以民众为中心的发展模型的基本构成要素 (参见 Eade, 1997; Plummer, 2000)。在我们对能力建设的理解中, 我们的基本信念是所有人都有权利平等分享资源, 作为自身的主人掌握自身的发展和命运。对这种权利的拒绝是贫穷和痛苦的根源。增强民众在选择中的决策能力以及采取行动达致这些目标是发展的基本所在。

^② 我们也理解到能力建设意味着对人力及其组织的长期投入, 所以在 2005 年, 我们开始发育妇女手工艺小组, 一直陪伴她们走到今天。

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路径，让边缘的民众自己发声，讲述自己的故事和见解，从叙述自身生活经验的过程中唤起被访者遗忘的主体。口述故事也能帮助我们发现和理解一些社区共同拥有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利用社区的资源来重建社区。^①

口述故事的收集也是发动民众和使民众参与的途径，因为收集故事是民众最能掌控和运用的手法。我们所在的少数民族社区，民众大部分不会汉语。面对语言障碍，^② 我们只能邀请民众一起参与故事的收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这项工作。2001 年我们在社区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口述故事收集活动，并且与村民一起编写了《平寨故事》一书。2005 年我们再次对妇女手工艺做口述故事的收集，一切显得驾轻就熟。我们和社区的妇女一起，在不同的寨子访问老妇人。老人家给我们讲述了自己的生活故事，虽然我们看到她们一生很辛劳地为生活打拼，但也看到她们的生存策略和智慧。她们告诉我们关于刺绣和手工艺的事情，讲述她们如何纺线织布，如何绣花，如何自己制作衣服，等等。在老人的房间里还保留着织布机、纺线的工具等，她们还会给我们示范这些手艺。在半年的口述故事收集之后，我们基本能把握过去平寨妇女手工艺制作的整体生产过程，以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

在平寨，所有做针线活用的布料都是妇女们自己织的。过去，平寨妇女从小就被教导如何做传统的刺绣。她们自己纺布和纱，用天然的矿物和植物来染布，制作多彩的衣服和装饰品。在老人的记忆中，她们以前是自己种棉花的，可是由于土地不够，平寨已经很久不种棉花了。如今她们只能从市场上购买不同颜色的棉线，然后邻居和亲戚一起帮忙拼线，最后用手工织布机织出自己的七彩壮锦。虽然还有一些老人懂得用天然的矿物和植物染布，但现在多数妇女只会用从市场

① 我们在贵州已经尝试过口述见证的方法，觉得非常有效，可参考古学斌和陆德泉（2002）的文章。口述见证和口述史的方法可以参考 Slim 和 Thompson（1995）；Perks & Thompson，1998 和 Yow，1994。

② 当地人说壮语，只有很少的年轻村民或受过教育的成年人可以讲汉语——普通话。因此，我们很难与当地居民直接进行交流。一方面，这是我们面对的不利条件；另一方面，这却又成为我们的优势，因为我们不得不保持谦虚，并且与受过教育的当地居民保持密切关系，后者经常成为我们的翻译。

上买来的化学染料染布了。

妇女们通常会在自己的衣服和日常用品（譬如背篋等）上绣花。她们绣花必须先在网上剪下样子，然后在网上刺绣。所有刺绣的颜色和图案富有民族特色，手工非常精致。刺绣是妇女们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也是妇女们引以为傲的手艺。平寨妇女的刺绣图案主要是花朵和其他她们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东西。

通过口述故事，我们和其他参与口述故事收集的年轻妇女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稳固的合作关系，我们有了共同努力的目标。在此过程中，年轻的妇女有机会听到村里老人讲的故事，并理解传统刺绣的意义。这是一个教育、赋权的过程，妇女们认回自己文化的根，明白了这手工艺的价值。年轻妇女对老人们表示尊敬，并且开始对一代代人传下来的文化遗产产生了兴趣。此外，老人们也重建了自信心，通过讲述自己的生命史以及和年轻妇女分享村子的历史与传统文化，她们发现了自己的能力，找回了骄傲，后来老人们也在小组中亲自恢复老布的制作，并将技术传给下一代。

口述故事收集之后我们还组织了分享会，我们都觉得刺绣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有几个妇女非常积极地要成立小组来推动刺绣产品的制作。看到她们的积极性和她们精美的刺绣，我们感到妇女手工艺项目具有可行性，于是决定进入下一步骤——小组的发育。

2. 手工艺小组的发育

在评估妇女手工艺小组的可行性之后，我们发现工具和材料在村里方便可得，因此决定组织一个妇女手工艺小组，因为我们相信加强合作是妇女能力建设和赋权的关键。我们想挑战强调个人主义和竞争的主流发展思维，希望透过手工艺项目推动一种新的集体合作形式的经济模式。我们从之前平寨妇女发展项目失败的经验中汲取教训，决定小规模地启动项目。在与妇女积极分子商量之后，我们确定了项目的目标：通过生产刺绣手工艺产品增加妇女的收入来支持她们孩子的教育；推动新型合作主义和妇女参与形式；透过经济的赋权提升平寨妇女的能力；保护平寨的传统文化和提升在地民众的文化认同与自信；提升消费者的绿色消费和公平贸易意识。

我们和妇女领袖凤一起，到各村寨寻找刺绣技术好的妇女，邀请她们加入妇女手工艺小组。我们帮助召集了几次小组会议，解释妇女

手工艺小组的理念和运作方式。妇女特别是年纪较大的妇女对我们的合作经济形式没有信心，因为她们对大锅饭记忆犹新，同时她们也担心市场前景不好，总觉得自己绣出来的东西城市消费者不会喜欢。虽然我们不断地解释合作的重要性和保护传统文化的可行性，也不断地保证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寻找市场，但最终只有7个妇女愿意参加妇女手工艺小组。

我们并没有因为这种情况而灰心，因为我们明白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村开始改革以来，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下，很多农业生产只以个人或单户为基础。农民除了婚礼、葬礼和新年之外很少合作。每户都在自己那块责任田上劳作，并没有合作的文化（Ku, 2003）。我们也知道如果能让合作取得成功，就必须通过各种培训和活动来推动妇女能力建设。

作为社区发展的协作者，我们通过不同的手段促进妇女发挥她们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我们协助妇女组织会议并讨论妇女手工艺合作项目的年度计划。我们也承诺给予妇女创业基金贷款，用于购买材料和工具，并报销她们去昆明等地学习参观的花销。

3. 设计和生产过程中的能力建设

为增强平寨妇女对手工艺产品的市场意识，2006年9月，我们支持妇女手工艺小组中的一些成员到著名旅游景点石林去参观旅游手工艺品市场。石林的大部分旅游产品都由彝族少数民族妇女生产。平寨妇女探访了当地一家妇女组织，参观了她们制作的旅游产品和她们的手工艺。她们同彝族妇女比较了针线活中的相同点与不同点，讨论了市场价格，并走访了旅行社的人。在第一次市场考察之后，平寨妇女们得出以下几点结论：这些手工艺产品的质量很差，市场价格太低；她们自己刺绣的风格和技术是独特的，不同于彝族妇女；旅游产品是机器生产的，她们的产品却是完全用手工制作的。这种考察增加了平寨妇女对市场的了解，也增强了她们的信心。她们从比较当中发现了自己刺绣技术的优势。

2006年10月，我们的工作人员带了一些刺绣产品到昆明，进行市场开发。我们找到了产品设计师，跟他一起探索如何把平寨妇女的刺绣设计成不同的产品。我们认为平寨妇女的刺绣非常精美，如果开发出一些精品的刺绣产品，一定可以得到懂得欣赏的消费者

的欢迎，到时不仅妇女可以增加收入，而且可以保护壮族的传统手工艺。设计师利用平寨妇女的刺绣设计了四种产品——布制书皮、贺年卡和礼品卡、刺绣镜框和抱枕套。我们把这些样品带回平寨村，妇女们都很高兴，她们兴奋地看到自己的刺绣竟然可以变成家居用品和装饰。

我们强调设计师的参与但同时也看重在地妇女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因此，原则上设计师并不改变妇女们刺绣的样式、色彩和风格。设计师只是在平寨妇女做出来的刺绣的基础上帮忙设计一些产品。我们也让妇女们学习自己成为产品设计师，尊重妇女们对产品的选择。我们告诉妇女，如果一些产品对她们没有意义，她们可以放弃这些产品。专业设计师的参与只是为了启发妇女的创造力。从设计师那里学到一些设计理念后，妇女们开始开发自己的产品。设计师设计的那几样产品，妇女们可以接受布制书皮、刺绣镜框和抱枕套，但她们不喜欢贺年卡和礼品卡，因为这些不是她们的文化，她们对此不熟悉，认为它们“没什么用”。

2006年11月，我们和妇女手工艺小组一起制订生产计划，并逐步落实。但是，当她们从市场上购买了绣线和布料等原材料，一切准备工作都完毕时，她们突然间告诉我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们明白这是妇女缺乏信心的表现。于是，2007年1月我们带领平寨妇女再次外出拜访另一家妇女刺绣协会，与妇女刺绣协会的带头人 and 协会成员进行深度的交流。这个妇女刺绣协会成立了3年，有3000名会员。她们从外面的工厂获得订单，然后把工作分给会员。她们的产品销往上海、北京和东南亚。会员的平均年收入为2000~5000元人民币。这个妇女刺绣协会的成功故事再次给了平寨妇女信心。

回来后，我们跟平寨妇女一起做了总结。这次拜访的组织还是彝族的，她们的针线活很不错，但她们的针法跟平寨妇女不同，属于十字绣。平寨妇女的刺绣是先把纸上的图案用剪刀剪下来，然后把剪纸放在织布上，一针针地绣。刺绣的效果是凸面的，跟机器做的很不同——机绣是平面的。她们也学习到这个组织的一些宝贵经验，譬如她们组织内部的分工非常细，有三个姐妹负责跑市场，还有负责做账的。她们还规定在农忙的季节不做刺绣活，只有会员才能“分到有

订单的活”。她们运作的方式也很简单：如果她们得到订单，就定好价格，会员过来“拿活”，完工之后送回产品。这是合作的一种方式。

实地走访开阔了平寨妇女的视野，并增强了她们合作的信心及组织意识。不久平寨妇女发展出了自己的组织和合作方式。我们还带平寨妇女拜访了一家时装公司的经理，商讨合作的可能性，接着到昆明看了一些民族手工艺商店和花鸟街（昆明最大的手工艺品市场）来激发妇女的创造性，帮助平寨妇女了解市场上流行的货品。我们还介绍在昆明开了一家高质量工艺品店的老板林先生给妇女，希望他作为手工艺产品设计者和店主可以与平寨妇女分享一些经营理念和市场运作的经验。在这个分享工作坊中，平寨妇女很高兴，因为她们学到了很多東西，譬如做生意的技巧，也知道了有三种手工艺品市场——大众市场、高质量市场和另类公平贸易的市场。平寨妇女在走访中感觉收获良多，得到了很多如何生产自己产品的点子。

4. 消费者教育和公平贸易的推动

回到平寨后，妇女们热烈地讨论了她们应该瞄准的市场类型，最终决定开拓精品的另类贸易市场。对她们而言，大众市场的价位太低，而且她们觉得大众市场产品的质量也差。如果做那么丑的刺绣，她们会觉得羞愧。她们真心地希望消费者能够懂得欣赏她们高质量的刺绣，而且更希望价格在某种程度上能反映她们的劳动和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她们传统文化的价值。

为帮助妇女进行市场测试，并增强她们与外界交易产品的信心，我们决定在两个国际研讨会上卖她们的产品，同时进行公共教育。从2007年2月到7月，平寨妇女做了大量的刺绣产品，例如可以挂在墙上的刺绣镜框、刺绣手机套、刺绣桌布、刺绣垫子和抱枕套、纸巾盒套、刺绣名片夹、刺绣棉笔套、刺绣情人手链等。妇女们短时间内进步神速，而且她们高度的创造力也让人惊讶。她们从设计师那儿与走访过的市场和商店的产品样式中吸收了大量的灵感和点子，她们成了自己产品的设计者。

在2007年7月16~20日香港理工大学举办的第15届国际社会发展联盟大会（ICSD）上，我们建了一个销售专柜和一个展览专柜来介

绍我们的项目并展示平寨妇女的手工艺品。我们提出的口号是“您的购买将会产生不同”“购买平寨母亲的手工刺绣产品，支持她们的经济独立”，“购买平寨妇女的手绣工艺品，让我们与她们成为公平交易的伙伴”。

让人倍受鼓舞的是她们的产品在大会上受到参会代表的高度赞扬，创下很好的销售纪录。许多人对这些刺绣产品的生产过程和产品之外的意义很感兴趣，他们希望更多地了解妇女手工艺小组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在国际社会发展联盟大会之后的那一周里，平寨妇女的产品出现在云南大学举办的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和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我们做了同在国际社会发展联盟大会上一样的事情，不同之处在于平寨妇女参加了这次会议。她们向当地和国际的参会代表介绍和销售自己的产品。刚开始，一些平寨妇女很害羞，不敢面对面地跟陌生人讲话。但她们很快克服了紧张心理，当她们看到代表们赞赏她们的产品并想购买时，她们笑得像花一样灿烂。尽管对很多参会代表尤其是本地的参会代表来说，她们的产品比一般旅游民族工艺品市场上产品的价格要高很多，但我们向他们一一解释平寨妇女产品价格的构成部分，让消费者明白公平贸易的原则——那就是，要肯定生产者的劳动价值和文化价值，在购买过程考虑的重点是免除购买产生的剥削，而不单单是价钱上的考虑。平寨妇女在会上进行了一次表演，并公开回应参会代表提出的问题。妇女们的变化让人印象深刻，她们如此勇敢，体现了真正的赋权。

5. 小组的巩固与发展

在这两次会议上，包括已卖的和参会代表订购的产品，她们差不多赚了 23700 元人民币。这一收益对妇女们来说是一大鼓励，然而下一阶段该如何进行呢？如何巩固其组织和规划将来的发展呢？

首先，我们让她们集体决定怎样用她们自己赚的钱。妇女们开始学习簿记和会计技术。去掉购买原料的成本 10000 元人民币，她们每人可以得到 2000 ~ 2800 元人民币。最可贵的是，她们决定留下 7000 元人民币作为妇女集体（合作）发展基金。

为了帮助平寨妇女巩固她们的组织并理解这种合作形式的意义，我们联系了贵州省很出名的杨建红苗族刺绣学校，希望妇女可以学习

这个组织的经验。杨建红苗族刺绣学校是一个民间组织，由当地妇女杨建红创办。她的目的是保存传统苗族文化以及增加当地妇女的收入。这个组织主要是提供刺绣技术培训，给年轻的苗族妇女提供工作机会。更重要的是，她以社会企业的方式运作它。不仅为了增收，而且为了赋权给妇女，增强她们的自尊和自信。她成功地推广她们的产品，现在产品远销大城市和海外，像中国台湾和日本。

我们项目的工作人员和妇女手工艺小组的成员在2007年12月去了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到杨建红苗族刺绣学校参观。杨建红女士介绍了学校的结构和运作，也介绍了她建立的苗族刺绣博物馆，里边收藏和展览了大量传统的苗族刺绣。平寨妇女和贵州的苗族妇女坐在一起就刺绣技术和组织管理运作的经验做了交流。这次走访让平寨妇女看到了未来，使她们在平寨推动妇女手工艺小组发展的信心大增。她们受到杨女士的鼓励，被她这么多年的坚持所感动，开始明白保存传统文化的意义，同时提高了积极参与的意识。

回到平寨后，她们做了年度规划，建立了妇女手工艺小组的管理体系和规范，并开始从其他自然村寨招募新成员。她们有明确的分工，例如，一人负责簿记和会计，一人负责质量控制，一人负责样式和产品的设计。通过建立管理体系和规范，她们增强了集体主义精神、信任感、资源共享和主体参与的意识。

到2008年7月我们还帮助妇女们建立了一个网站来介绍项目，分享她们的故事，推广她们的产品。从2008年到现在，她们成功地建立了公平贸易网络，开发了选择性市场。例如，她们先后接到香港大学学生会、香港理工大学、公平贸易店、香港乐施会还有中欧论坛等的订单。她们开始讨论与香港一家名为公平交易动力的非政府组织进行长期合作，也开始收集传统的壮族刺绣作品，并准备建立一个壮族传统刺绣博物馆。她们在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研究和发展网络与社联的商务中心设立了橱窗，来陈列和展览平寨妇女的手工艺产品。2010年我们与香港地脉基金会、鄂伦春基金会合作在母亲节一起举办了名为“母亲与女儿”的循环展，这个展览将从香港移师北京、上海、昆明等地，希望教育公众，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理念，也愿意参与到我们的事业中来。

(四) 行动研究的第四阶段

到第四阶段，我们的行动研究基本上完成了一个周期。在行动研究的计划中，我们到了检验行动结果的阶段。经过几年的发展，这项农村社会工作计划基本上朝着我们设想的推动妇女能力建设和经济条件改善的目标运作。最让人高兴的是发展了一个目标坚定的妇女核心小组，她们热心于参与妇女手工艺小组的工作，把它看成自己的事业。另外，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当地妇女的团结和合作意识逐渐增强，她们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在增强。通过推动妇女参与和赋权，很多妇女重新有了控制自己命运的感觉，并对自己的文化遗产产生了更强的认同感。以下算是我们看到的成果。

(1) 从消极接受者到积极行动者。妇女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行动者。在项目的开始阶段，妇女认为她们是为外来的社区组织者工作，因此她们只关心能够从我们这里拿到多少钱。但现在她们清晰地意识到这是她们自己的项目和手工艺小组。发展的唯一可能性就是依靠小组成员的共同努力。在此过程中，平寨妇女也发现了她们自身的能力和潜力。刚开始，她们几次要求找些专家来教她们设计产品或简单地设计好模板她们来模仿。但当平寨妇女有机会参观手工艺品市场，与其他少数民族妇女比较，她们的信心增强了。当专业设计师的介入最小化时，她们的创造力和设计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平寨妇女成了本土设计师：她们向我们展示再创造刺绣样式、颜色和风格的能力。项目朝着我们培育妇女手工艺小组的初衷发展——“在社区中设计，和社区一起设计，为社区设计。”

(2) 推动民众转向集体主义，增强合作精神。这个项目也打破了村子里的个人主义恶习，推动民众转向了集体主义。刚开始，当我们强调合作组织建设时，平寨妇女表现得很冷漠，不明白为何要合作。但是，当她们看到合作和相互帮助的益处时，她们开始理解合作的意义。面对生活的压力，妇女们不再孤单。她们可以一起商量、一起分担，位于平寨中心的妇女手工艺工作坊成为她们喜欢聚集的地方。

(3) 促进妇女管理和销售方面知识的增长和能力提升。这个项目另一方面的能力建设是增加妇女在销售和交易方面的知识。经过两年

训练之后，妇女们掌握了做生意的基本知识，例如成本计算、价格设定、市场风险规避和产品制造。

(4) 增强文化认同和文化保护意识。文化认同危机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另一个障碍。在市场经济意识的主导下，文化的价值往往被用市场的价值来衡量，价格高、销路好才叫有价值。之前因为妇女觉得刺绣没有价值，是因为没有市场，所以大多数年轻女孩不愿学习刺绣。在此过程中，我们让妇女看到她们的刺绣是珍贵的，也让她们明白在主流市场没有销路和价钱低是因为其中存在的剥削和不公平贸易。当我们转向公平贸易的市场后，平寨妇女看到了自己产品的价值，因为购买她们产品的消费者或团体都是因为欣赏她们刺绣的手工和文化意义，而不是看重产品的价格。透过刺绣，她们的收入不断增加，吸引了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她们开始吸收年轻妇女，让她们学习刺绣。特别是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许多年轻妇女失业回到了家乡，陆续参加了妇女手工艺小组。成员们都很受鼓舞。平寨妇女现在有了文化保护的意识，她们开始收集古老的刺绣和织物，也准备建一个博物馆。她们还与平寨老年人协会里的老妇人合作，恢复古老的布料生产和染布技术。她们希望传统的刺绣技术可以得到保存和发展。

(5) 经济赋权与性别赋权。我们项目的目标很清晰：希望透过经济赋权使社区的性别关系得到改变，妇女能够得到赋权。我们深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在这几年的时间里，从细微之处我们看到手工艺小组的妇女与丈夫间关系的改变。在平寨，壮族妇女的家庭地位是很低的，家务和农活基本上都由妇女来承担。在饭桌上，我们每次都看到妇女在男人吃饱喝足后才开始用餐。后来我们看到，手工艺小组妇女的丈夫对妻子的态度慢慢改变，甚至重视起她们的工作来。我们经常看到，当妇女集中在平寨中心的妇女手工艺工作坊赶工的时候，中午各家的男人都会做好午饭给她们送来。每次跟妇女们聊起这事，她们都笑得很开心。对领袖凤来说，她丈夫的改变更大。以前她丈夫基本什么事都不干：家务不干，田也不耕。但自从凤挑起妇女手工艺小组的大梁，为家庭经济做出很大贡献后，她丈夫的态度也开始积极起来。除了支持凤的工作外，也参加了我们另外一个组织——生态大米种植合作社。妇女们还跟我们分享了她们经济自主的重要性，譬如

凤说 “以前我们腰包里没钱，每次跟老公要点零用钱都很难，还要看他们脸色。到乡上赶集，想买点什么都不行，都要问准老公。现在我们腰包有钱了，要买什么就买什么。要上街就自己去，不用理他了，哈哈……”经济上的自主让妇女们有了尊严，每当说到这些的时候，她们都笑得特别开心，让我们深深地感到这对她们来说有多么重要，也是支撑她们走下去的动力。

（五）行动研究的第五阶段

到了一个行动研究周期的最后阶段，我们强调总结经验和学习。我们必须从行动中提炼发现，总结我们对农村发展和农村社会工作的看法。经过这么多年的行动和思考，我们发现农村贫困的核心原因不完全是低水平的教育、土地贫瘠、村庄位置偏远、技术无法更新，以及缺乏市场经济的相关知识等，更多的是农民失去对发展过程的控制并变得被动无助。当面对外来发展主义理念的冲击时，他们对自己发展的道路产生了错误的理解，以为农业商品化后就能致富，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就叫发展，外出打工就是改善生活，抛弃传统就是“先进文明”。这一切导致他们对农业生产失去了信心，也对传统产生了怀疑。除了身份认同危机和自信心低落外，农村发展的另一个障碍是农户个人主义的抬头，没有合作和集体的支撑，农户个人往往无法与市场竞争，成为市场经济的牺牲品。

因此，为了农村可持续发展，农村社会工作首先要关注的不应只是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还要强调能力建设和赋权的工作。我们应努力在经济赋权的过程中提升在地民众的文化自尊和信心，达到文化赋权和性别赋权。我们在平寨的工作只是另类发展和农民合作的一种尝试。我们相信，发展没有唯一路径，完全取决于能否使当地民众成为发展的主体，让他们意识猛醒、能力提升以避免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被边缘化。^①

^① 然而，行动研究也非常强调研究者的反身性（reflexivity），那就是在行动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对自身反映照看。对于反思我们自己行动背后的价值观、我们与村民的权力关系等，恐怕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整理才能跟读者分享。这些年来，我们也不断对自身的行动做出自我反思批判。可参阅古学斌、张和清与杨锡聪（2007）合写的“专业陷阱与文化识盲：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的文化问题”一文。

结 论

在总结全文之际，笔者希望把文章放置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脉络中来讨论。笔者尝试梳理行动研究和社会工作的关系，其实背后有两重心意：第一是看见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在学术上面临的困境，希冀另辟出路；第二是希望把自己实践过且觉得可行的方法与中国内地的社会工作同人分享，一起建立另类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

从2001年开始，笔者有幸参与推动中国内地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陪伴中国内地社会工作专业成长已12年。中国内地社会工作的快速成长的确让国内外的同行都欣喜不已，然而在成长过程中也遇到学术困境。近年来，不断听到社会工作学科内外各种对社会工作专业批评的声音。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包括社会学、人类学等）的学者口中，社会工作常常被视为缺乏学术和理论水平的学科，认为社工只会做、不会写；社会工作同人似乎也认定自己水平不够，常常觉得书写的那些关于社会工作实务/实践的文章难以登学术大雅之堂。笔者曾多次与年轻的社会工作学者们交流，鼓励他们去做实务。虽然他们都很认同实务/实践对社会工作专业的重要性，但也很坦诚地说出两大难处：一是做实务需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二是做实务写不出文章，即使写出来也很难在社会学或其他社会科学期刊上登出。面对学术评鉴和升职的压力，他们只能放弃实务，转向其他所谓“纯学术”的书写。当然，笔者很能体会年轻的社会工作学者们的心境，但觉得第二大难处实际上是他们对学术研究或社会工作实务/行动研究的误解。笔者并不完全否定传统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但希望社会工作同人能够认识自身学科专业的特性及自身学科在知识的本质和研究取向上跟其他社会科学的分野，这样才能摆脱学科的学术困境，建立自身学科的知识 and 理论，从而建立学科的自信。笔者及所在的团队这么多年来落地实践，虽然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但也收获满满。而且我们在行动当中，也获得了不一样的对在地社区和民众的认知，以及对社会工作实践的不一样的觉识。

笔者根据十几年来推动农村社会工作的经验认为，行动研究方法是社会工作的一种重要的介入策略。它集研究、教育和实践于一体：

我们的行动可以服务于在地社区、改变社区的状况；通过教育的过程，我们也可以跟民众一同成长。在民众意识到被启蒙的同时，社会工作者因向在地民众学习的缘故，也改变了自身对社区的很多固化观念；通过研究，我们能够与学科专业对话，反思社会工作理论的局限，进行提炼和总结，也让社会工作者能够建构符合在地脉络的新理论、新模式。

行动研究有多元的视角和取向，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强调的是参与式的范式。那就是研究者尽量转换自己的角色成为行动过程的推动者（facilitators），致力于创造空间让在地民众成为研究的伙伴和共同研究者。要再次强调的是，行动研究基本上颠覆了传统研究方法，强调服务在地民众，让在地民众参与到研究项目的每个步骤中，包括资料如何收集、分析和最后的资料的传播与使用。其终极目标是希望在一起操控整个研究的过程中，让在地民众成为与我们一同前进的伙伴，最后能成为行动的主体。这样的目标，不就是社会工作专业的目标和前进的方向吗？！

参考文献

- 保罗·弗雷勒（2003）：《受压迫者教育学》，方永泉译，台北：远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 古学斌、陆德泉（2002）：“口述历史与发展行动的反省——以中国贫困地区教育扶贫项目为例”，《香港社会学年报》，第3期，第181~210页。
- 古学斌、张和清、杨锡聪（2004）：“地方国家、经济干预和农村贫困：一个中国西南村落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第79~88页。
- 古学斌、张和清、杨锡聪（2007）：“专业陷阱与文化识盲：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的文化问题”，《社会学研究》，第6期，第161~179页。
- 陶蕃瀛（2004）：“行动研究：一种增强权能的助人工作方法”，《应用心理研究》，第23期，第33~48页。
- 夏林清（1993）：“实践取向的研究方法”，《由实务取向到社会实践》，台北：张老师出版社，第3~27页。
- 严海蓉（2000）：“现代化的幻影：消费和生产的双人舞”，《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48期，第95~134页。
- 甄晓兰（1995）：“合作行动研究：进行教育研究的另一种方式”，《嘉义师范学院学报》，第9期，第297~319页。
- Collier, Ken (2006). *Social Work with Rural Peoples*. Vancouver: New Star Books.
- Eade, D. (1997). *Capacity-building: An Approach to People-centred Development*. Oxford: Oxfam.

- Elden ,M. & Chisholm , R. P. (1993) . Emerging Varieties of Action Research: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Human Relations* ,46 ,121 – 142.
- Fuller , R. & Petch , A. (1995) . *Practitioner Research*. Buckingham ,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Gaventa ,J. (1988) . Participatory Research in North America. *Convergence* ,24 , 19 – 28.
- Ginsberg , L. H. (2005) . *Social Work in Rural Communities*. Virginia , U. S. A. : CSWE Press.
- Greenwood , D. J. , Whyte , W. F. , & Harkavy , I. (1993) .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As a Process and As a Goal. *Human Relations* ,46 (2) : 175 – 192.
- Kemmis ,S. & McTaggart , R. (1988) . *The Action Research Planner*. Geelong , Victoria: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 Ku , Hok Bun (2003) . *Moral Politics in a South Chinese Village: Responsibility , Reciprocity and Resistance*. Lanham ,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Lewin , K. (1947) . Action Research and Minority Problem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 2 (4) , 34 – 46.
- Li , V. C. , et al. (2001) . Capacity Building to Improve Women’s Health in Rural China.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52 (2) , 279 – 292.
- Lohmann , Nancy & Roger A. Lohmann (2005) . *Rural Social Work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oyer , A. , Coristine , M. , Maclean , L. , & Meyer , M. (1999) . A Model for Building Collective Capacity in Community-based Programs: The Elderly in Need Project. *Public Health Nursing* , 16 (3) , 205 – 214.
- Park , P. (1992) . The Discovery of Participatory Research As a New Scientific Paradigm: Personal and Intellectual Accounts.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Winter: 29 – 42.
- Perks , R. & Thompson , A. (1998) . *The Oral History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 Plummer , J. (2000) . *Municipalities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London and Sterling: Earthscan.
- Pun , Ngai (2003) . Subsumption or Consumption?: The Phantom of Consumer Revolution in Globalizing China. *Cultural Anthropology* , 18 (4) , November , pp. 469 – 492.
- Pun , Ngai (2005) . *Making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Reason , R. & Bradbury , H. (2005) . *Handbook of Action Research: Participative Inquiry and Practice*. Thousand Oaks , CA: Sage.
- Saleebey , D. (1997) . *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New York: Longman.
- Savin-Baden , M. & Major , C. H. (2013) .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 Essential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 Scales , T. Laine & Calvin L. Streeter (2003) . *Rural Social Work: Building and Sustaining Community Assets*. Belmont , CA: Brooks/Cole/Thomson Learning.
- Sherraden , M. (1991) . *Assets and the Poor: A New American Welfare Policy*. Armonk , NY: M. E. Sharpe.
- Slim , H. & P. Thompson (1995) . *Listening for a Change: Oral Testimony and Community*

- Development*. London: New Society Publishers.
- Somekh ,B. & Lewin ,C. (2005) .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s*. London: Sage.
- Stringer ,E. T. (1999) . *Action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usman ,G. (1983) . Action Research: A Sociotechnical Systems Perspective. Ed. G. Morgan , *Beyond Method: Strategies for Social Research*.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95 – 113.
- Templeman ,Sharon B. (2005) . Building Assets in Rural Communities through Service Learning. In Leon H. Ginsberg edited ,*Social Work in Rural Communities*. Virginia , U. S. A: CSWE Press.
- Thompson ,Paul (1988) .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ice ,Carolyn J. (2005) . Celebrating Rural Communities: A Strengths Assessment. In Leon H. Ginsberg edited ,*Social Work in Rural Communities*. Virginia , U. S. A: CSWE Press.
- Whyte ,W. F. (1991) .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 Yow ,Valerie Raleigh (1994) . *Recording Oral History*. London: Sage.

Action Research and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Ku Hok Bun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intends to introduce the methodology of action research to Chinese audiences and argues that there is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tion research and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Through an action research project conducted in a Yunnan village ,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the practice of action research and let the audiences understand how social workers in action research process responded to the need of local community ,empowered local people and helped them become the subject of their own development.

Key words: action research , methodology ,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 empowerment